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

□邱小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任官回避制度的国家。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古代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并保证官员任职期间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公正地履行职务。历史上，任官回避制度在巩固中央集权，预防权力腐败方面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是随着对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准则的人事制度的否定逐步产生的，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历史上，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配置权力，在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下，家族内部为权力而争斗，成为当时众多战乱的根源，且影响皇权的稳定。统治者意识到了亲属、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威胁以及诸多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于是产生了回避制度。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国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不用本县人的措施。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未形成不须触碰的法规，到了东汉后期，比较严格的规定出台了。

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是东汉桓帝时期出台的“三护法”。“三护法”明确规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或两个地方的长官虽然没有姻亲关系，也要回避籍贯上的对应关系（如甲州刺史是乙州人，则乙州刺史就不能用甲州人），以防他们用相互包庇对方亲属的办法搞权权交易。东汉选任地方官员过程中，“三护法”得到了实际的执行。如东汉官员史弼，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由于岳父母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回避制度在隋唐以后得到丰富和发展，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明代，经朱元璋的严格定制，其内容终至完备。综而言之，中国古代任官回避主要有亲属回避、地方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种基本形式。

亲属回避。它是回避制度中最先确立的回避关系，“三护法”中即有。需要回避的亲属范围，历代各有不同，唐时主要限制在“大功”以上的近亲。宋代范围扩大，宋仁宗时出台的《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制》，将避亲范围扩大到“缌麻”以上，即同一高祖父母名下的旁系和各种姻亲。亲属回避要求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注：“大功”“缌麻”是五服中所列的两种孝服，表明不同的亲疏关系）

明清时，亲属回避的范围大致上包括直系、旁系血亲和姻亲。清代《大清会典》规定：凡叔伯、兄弟在同一衙门任职者，不论辈分，均以小官回避大官；如官职相等，则以后任回避先任。如系祖孙父子关系，其中一方为某部门长官，则属官回避长官，其余无论品级及任官先后，均令子孙回避尊长。总之，亲属回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摆脱亲属关系的羁绊，避免腐败的发生。

地方回避。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自汉代已经开始，东汉的“三护法”中规定，官员任职要回避自身的本籍，这一做法到唐代之后成为定制。地区回避的具体范围，不同朝代有不同要求，总的来看，越到后朝回避的范围越大，执行越严格。

唐时，地方州县长官一律不得在本籍及临近州县任职。宋代，地方官要回避本州和本府。

明清时期，地区回避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除本籍回避外，清时还有寄籍、商籍的回避规定。寄籍，即在本籍之外官员或其父辈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商籍，指官员从事商业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内，官员都有可能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必要加以限制。通过地方官员任职本籍回避，预防和削弱了地方独立势力，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子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了过多的社会关系造出人情网。

职务回避。中国古代，一些特殊的职务对任职者有特别的要求，称之为职务回避。如中央大员的亲属不得担任监察官和谏官。监察官的避亲制度比较严格。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时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监察官，以避免父有过，子不便弹劾。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合称），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曾任官之地、寓居之地等，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如主管监察官与案件牵涉仇嫌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的。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唐代起已开始有亲仇回避的原则。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要回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财政、税收等事，明清时期也有相应的职务回避要求。明代规定，负责国家财政收入的户部官吏不得由江苏、浙江、江西人出任，因上述地区的税赋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以原籍之人担任恐其与当地势力勾结，侵吞国库。清时规定，曾任盐商，或祖孙、父子、叔伯、兄弟之近亲中有从事盐商者，都不得任管理盐政的户部职务，以防其以权谋私。

通过特殊职务，如监察、税务、司法等职的回避，对特殊部门的防腐促廉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国家机器正常运行。

科举回避。隋末唐初，形成了科举取士的任官选拔制度。为防止考官与应试者勾通作弊，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唐政府又制定出了科考中的各种回避规定，科举回避制度出现。

唐开元时代起，凡与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都必须回避他地，另行考试。到了宋代，“钟鼎之家”的子弟们在科举考试后，必须再加试一场，以示公允。

科举回避是科举取士公正性要求的必然结果。科举是寒门儒生通向仕途的独木桥，因其涉及个人出路，取与不取举足轻重。因此，铤而走险之人大而有之，历史上科举舞弊案并不少见。所以统治者力图通过科举回避制度在选拔人才过程中避免由于亲故、同籍等关系而造成请托、作弊行为。

总之，在重视宗族血缘之情的中国古代社会，回避制度作为用于防止同宗、同乡徇私，用于防止官员限入地区性利益之中的一种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使吏治得到相对的澄清。

研究中国古代的任官回避制度，吸取一些合理的积极因素，古为今用，重视回避制度在当今人才选拔，尤其是在国家公务员选拔任用中的作用，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有积极现实意义的。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公务员回避制度，由于各国国情、历史文化不同，每个国家的回避理由、程序、范围等都有不同。事实上，回避制度只有与本国政治体制、历史条件、文化差异、风俗习惯等相结合才能成功。

中外制度史

鹿鸣馆

——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侧影

□宋 颖

19 世纪 70 年代初，为把日本打造成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近代强国，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方针。文明开化就是将西方近代制度、学术、思想等引进日本，使日本迅速向近代化转变。文明开化促成了日本近代教育、科技、新闻等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宣扬西方近代人文思想理念的思想启蒙运动对消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和禁锢，促进西方近代价值观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变革有力促进了日本向近代国家转变。

但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文明开化时期——激进的全盘西化的鹿鸣馆时期。其原因是，明治政府幻想以此来迅速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达到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封建时代末期，在列强的武力威逼下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不仅使日本蒙受了巨大国辱和经济上的损失，也使普通国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激烈反抗，最终爆发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明治维新，彻底推翻了封建政权。因此，年轻的新政权深深感到，不彻底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就不能完成维新的使命，实现国家独立、与万国并立的明治梦。

然而，当时的日本综合国力与列强相差悬殊，因此列强根本不把日本作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日本修改条约的要求，甚至还提出增加比原条约更加有损日本利益的内容。在列强的百般阻挠和刁难下，修改条约谈判屡屡受挫，步履维艰，毫无实质性进展。明治政府十分清楚，日本绝无靠武力解决这一外交难题的可能，因而决定另辟蹊径，幻想通过展示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国家形象来获得列强的好感，以换取列强同意日本修改条约的要求。

于是，明治政府开始推行激进的欧化政策。

1883 年明治政府斥巨资建造的鹿鸣馆在东京落成。这座由西洋人设计的欧式建筑是明治政府用于招待外国贵宾以及外国官员的豪华社交场所。1883 年 11 月 28 日，日本外务卿在此举行了有 1200 多名外国公使和日本的达官显贵参加的盛大开馆仪式。从此这座馆名取自中国《诗经》、意即迎宾会客之所的社交馆，成为对外展示日本文明开化新形象的大舞台。

在富丽堂皇、花团锦簇的鹿鸣馆内，全身西式打扮装束、受过西方社交礼仪培养教育的日本名门闺秀，伴着悠扬的舞曲与洋人翩翩起舞，舞姿优雅，华服翻飞，一派高贵典雅、和睦融融的景象。鹿鸣馆宴会厅的餐桌上，摆放着高档餐具，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供客人尽情享用。夜晚，璀璨的烟火在鹿鸣馆外的天空绽放，为晚会烘托气氛，供宾客欣赏。明治政府还在鹿鸣馆内设立日本皇族与高官以及民间有势力的人为会员、与外国人交际的国际俱乐部。俱乐部内的交谈只限于英语，彰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鹿鸣馆内的欧化大戏一幕幕上演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在改造帝国首都的形象上大做文章。明治政府聘用西方建筑师，按西洋模式规划首都和设计首都的主要建筑物，并指示企业家斥巨资，建造欧式的帝国饭店，以显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欧美国民毫无二致。为便于与西方交流，以及让西方了解日本，明治政府还打算废除日本的传统文字，改用罗马字为国语。另外，还大力推动戏剧改革，大规模改造日本传统的演剧、戏剧表演形式，推广欧式戏剧的演出。

然而，这出精心打造、极力取悦西方的欧化大戏，却丝毫没有打动它的观众——欧美列强的心。日本并没能因此赢得列强的尊重和平等相待，日本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提高。

在此期间，经过长达七八年旷日持久的谈判，列强给出的修改条约的条件是：日本要遵循欧美的法理原则制定一部法典，该法典要以英文提交列强审查，得到同意后方可实施；日本法庭必须雇佣外籍法官，在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时，外籍法官还必须占到多数。同时，日本还要开放全境，承认外国人在日本本土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旅行、居住、营业和拥有不动产的权利。

日本法典要经外国人审查后方可通过，这是列强对日本立法权的干涉。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必须有外籍法官参与，外籍法官还要占多数，这是对日本司法权的干涉。而开放内地，则将外国人过去仅限于租界的特权扩展到全国。这些内容较之旧条约对日本的侵害更为严重。因此，这些内容一经传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朝野共怒，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迫于各方压力，明治政府无奈宣布条约会议无限延期。为修改条约而极力推行欧化政策的外务卿也黯然下台。热闹一时的欧化大戏也随之落下帷幕。

实际上，这场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这股欧化风潮正如一些冷静的日本政治家批评的那样，是“超过实力”的“夸饰外表”。当时日本渲染的一些欧化“景观”，并非日本国力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真正体现，而是明治政府几乎举全国之力、甚至依靠民间企业家的财力营造出来的文明假象。

当时真实的日本，还处于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各方面基础都十分薄弱。而明治政府却耗费大量财力、物力推行激进的欧化政策，大规模兴建西式楼堂馆所，这样的面子工程对增强国力、提高文明程度并无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以上流社会为对象的高价消费文明”。以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为极少数人提供极端奢侈的物质享受，以便于向西方展示日本国民已经享有与欧美国民同等程度的文明生活，实在是自欺欺人，自我陶醉。欧式建筑的规模以及豪华程度、上流人士西方语言运用的熟练程度、西方社交礼仪模仿的程度，这些都丝毫改变不了日本被歧视被压迫的处境。

最终，日本还是通过从根本上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建立起近代政治、教育体制，普及完善近代教育，大力培养和储备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科技和近代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富国强兵。

1895 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1897 年，列强与日本在谈判桌上签订了新的条约。新条约于 1899 年生效。列强在日本拥有治外法权的屈辱性条约，随新条约的生效而废除。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1911 年日本收回了全部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全部主权，国家彻底独立，并加入了列强的队伍，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实现了“与万国并立”的明治梦。

鹿鸣馆时期的欧化大戏落幕已有一百多年，但对那段历史的追忆和思考，并没有随着鹿鸣馆内灯火的熄灭而停息。温故这段历史，会给今天诸多启示，以史为鉴，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最佳路径。

史 镜

官迷张敬儿

□张晓政

张敬儿不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不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但其权欲熏心、终致灭亡的一生却颇值得一读，值得人们思考。

张敬儿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南北朝时期，原名张狗儿。由于名字过于粗俗，后被宋明帝改为张敬儿。他还有个弟弟叫张猪儿，联系到他的父亲叫张丑，可见，张敬儿的出身相当低微。据《南齐书·张敬儿传》记载，张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凭借这一优势，张敬儿参军入伍，并奋勇作战，依靠军功一直当上了老家南阳郡的太守。

如果历史只到这里结束，张敬儿的一生，倒是颇为可圈可点的励志故事，但遗憾的是，张敬儿的“抱负”显然不止于此。事实上，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不知疲倦永远追求官位的一生。例如，他之所以当上南阳郡太守，就是当年打仗时于阵前向宋明帝求来的。

当时正处刘宋末期，权力斗争险恶，幸运的是张敬儿在历次斗争中都坚定地站在了胜利者萧道成一边。公元 474 年，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叛乱，朝廷派萧道成拒敌于新亭。张敬儿向萧道成献计，愿诈降以取刘休范。萧道成许诺，如若事成，便让张敬儿当南阳郡所属雍州的刺史。谁知等到张敬儿真的把刘休范的人头提回来，萧道成却反悔了，认为雍州州治所在地襄阳是重镇，张敬儿人位俱轻，不宜居之。张敬儿反复向萧道成讨赏，萧道成始终不答应。情急之下，张敬儿不惜挑拨萧道成与另一重臣、荆州刺史沈攸之的关系，说沈攸之在荆州莫测所为，雍州与荆州相邻，如不让他去雍州，“以表里制之，恐非公之利”。萧道成笑而无言，果真让张敬儿去了雍州当刺史。而张敬儿也在后来萧道成平定沈攸之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

公元 479 年，萧道成篡位自立，改国号为齐，论功行赏，继续给张敬儿加官。或许是知道张敬儿这一喜好，萧道成临终前，还不忘在遗诏中加予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

正所谓物极必反。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齐武帝萧赜继位。按说，新老皇帝交替之际正是最敏感的时候，张敬儿是开朝功臣，又差不多到了人臣能得之极位，更应该低调谨慎。但张敬儿似乎既不明白也不知足。张敬儿有个特点，就是好信梦。正在这节骨眼上，他的老婆突然对他说：“我从前梦见手热如火，你就当了南阳太守。后来梦见半身热，你又当了雍州刺史。如今又梦见浑身热了。”官迷心窍的张敬儿不但没有警觉，反而火上加油说：“我自己可也梦见老家社树高高至天呢！”其实张敬儿的本意，不过还想让新皇帝继续给他升官罢了，但可想而知，当这些话传到齐武帝耳中，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都已经如此显贵了，还不满足，难道还要谋反不成？终于，齐武帝设下鸿门宴，当众将张敬儿收捕。被抓之时，张敬儿将头上官帽掷到地上，大声喊道：“此物误我！”

一生都在追逐官位的张敬儿临死之前，总算明白了“此物误我”，而他也成了历史上可笑可叹的官迷的典型。张敬儿孜孜不倦求官的一生，给了我们许多思考。他的悲剧，或许还不在于求官本身。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来看，想当大官也不是难以启齿的坏事，因为越大的官客观上也意味着越大的为人民服务的舞台。即使从事业发展的角度，追求进步向上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张敬儿之所以想当官，显然并没有这么崇高的追求和境界，他当官的一大动力就是发财。如在平定沈攸之之乱时，他“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物数十万，悉以入私”，全部收进了自己腰包。

孔子曾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情。而张敬儿显然更缺乏这点。他本是武将，冲锋陷阵可以，处决政事就是赶鸭子上架——强己所难了。随着官职的迁升，朝廷将他调到中央，张敬儿不识朝仪，于是连续几天关在密室里，学习“揖让答对，空中俯仰”，连侍妾们看了都偷偷发笑。事实也证明，他的当官生涯，并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百姓称道的政绩。如此没有自知之明，又怎能不在当时凶险复杂的环境中折戟沉沙、引人哂笑？

传说武则天曾用飞蛾扑火来比喻那些前仆后继不惜身殉官场的人们。古往今来，这样的飞蛾不知当有多少！张敬儿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克斯·韦伯说过，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需要具有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责任感与判断力。但多少在仕途之路上苦苦跋涉的人们，却很少静下心来、回过头来，思考自己以及人生。他们要么一生都在跑官要官的路上，或者因为得不到而心急如焚须发尽白，或者得到了，但却因为能力不胜任而活得很累；要么利欲熏心，在买官卖官的路上，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把自己也玩没了。到底应当如何对待官位？或者说，做官是为了什么？为名，为利，还是为民？是不能不让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张敬儿的一生来看，出发点的错误，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决定了他的官场人生必将是一场错误。这就是他留给今天人们最大的启示。

有所思

晏阳初的三次感动

□游宇明

1989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致电家居纽约的晏阳初，祝贺他 99 岁生日。贺词说：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布什对晏阳初的评价并非过誉。晏阳初的所作所为贯穿了一个“善”字。这种“善”与晏阳初早年的三次感动有关。

1903 年，晏阳初还是一个 13 岁的少年，做塾师兼乡医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内地教会创办的华英教堂读书。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更结识了对他一生很有影响的人——姚明哲牧师。姚牧师是英国人，也是这所西学堂的校长，他一人教数门功课：英文、数学、地理……他原本是测量员，因为反感当时一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瞧不起华人，于是放弃本业，从事神职，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姚牧师从不对学生啰嗦地讲说《圣经》，只是以慈爱和蔼的态度与学生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晏阳初对姚牧师的为人极其敬佩。此次感动使晏阳初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好人，干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晏阳初的第二次感动来自于姚牧师引介的传教士斯图尔特。晏阳初最初担任的是斯图尔特的翻译与助手。在工作中，斯图尔特发现晏阳初非常勤奋好学，决定推荐晏阳初到香港深造，并且不顾路途艰难，陪同晏阳初从成都转重庆经上海，最后抵达香港。从斯图尔特身上，晏阳初感受到的是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晏阳初后来回顾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与他一见，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与思想的发展。”

1918 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去往一战的法国战场。那里有 20 多万挖战壕、救伤员的华工，晏阳初做起了这些华工的翻译。翻译之余，他替华工写家信。后来请他写家信的人越来越多，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因此创办了华工识字班。晏阳初在教华工识字方面动了许多脑筋，他先是在班上亲自教会一批人，然后又让这批人去教尚未识字的学生，循环往复，希望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为了扩大华工识字的成果，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某日，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意是这样的：“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 10 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 个法郎。”华工辛苦工作三年，只得到了 365 个法郎的报酬，然而为了支持晏阳初办报，他居然将这笔非常珍贵的钱捐了出来，晏阳初自然感动不已。他说：“我在法国，原想是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这次感动让晏阳初树立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平民教育事业的志向。